

大学之所以为大

—— 高等教育纵横谈

DAXUE ZHI SUOYI WEI DA

张翼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学之所以为大

——
高等教育纵横谈

DAXUE ZHI SUOYI WEI DA

张翼星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所以为大:高等教育纵横谈/张翼星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656-1621-1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319 号

DAXUE ZHI SUO YI WEI DA

大学之所以为大

——高等教育纵横谈

张翼星 著



责任编辑 欧家作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83 千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进入新世纪十几年来，高等教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热门话题。从中央领导到坊间市民都对此议论纷纷：“高等教育质量”罕见地两次进入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还成为每年“两会”政府报告的一个必备内容；“钱学森之问”反映了科学大师对当今中国大学教育质量的疑虑；殷实家庭考虑是否将子女送出国外就读；《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近万名受访者中有34%的人后悔上大学，其中51%认为是没有学到有用东西；许多行业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应聘者，而不少高校毕业生却就业困难。中国高等教育似乎是有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于是各方面的人士，包括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都来为中国高等教育号脉、诊断、治病。因为毕竟高等教育，大学教育关乎大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

张翼星教授就是这样一位热心的大学老师。他专业哲学，在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卓有成就。也许是习惯于从哲学高度上看待事物，他结合教学经常深入思考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且努力实践，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活动。20世纪90年代，北大希冀培养具有宽口径、高层次的人文学科人才，举办了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文科综合试验班”，翼星教授就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班主任工作，做了大量有益的开创性探索。后来北大教务部门又成立了“老教授教学调研组”（相当于现在许多大学都有的教学督导组），他是骨干，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从听课和从学生反映中了解情况，提出了很多改进教学的意见，对学校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结合现实情况，阅读了大量北大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文献，以史为鉴，综合比较，对当下大学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做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思索，写下了许多文章，这就结成了这个集子。

读了这批文章，我觉得张翼星教授是从大学的本源上找到了当前高等教育病根的，因而也开出来一系列对症的药方。我以为这是很关键、很根本的。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大学“异化”了，成为“非大学”了。本来，中国大学的诞生就跟拜为老师的西方大学根本不同，带有

浓重的工具色彩，承载着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强的重任。之后，教育又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新时期，不少大学人自己也以能从社会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的中心而沾沾自喜，以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技术进步的孵化器、政治昌明的思想库为荣耀。的确，大学应该、而且可以起到这些作用。但是不要忘了，大学本身是一个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其根本或核心任务是育人，上述这些功能是通过或结合育人而达成的。如果脱离了育人去单纯追求上述功能，把大学变成为经济机构、科研机构、政法机构，就是舍本求末，就是大学“异化”了，就会弊端丛生。

因此，张翼星教授极力主张办大学要回归大学的本原。他在多篇文章中介绍、推崇蔡元培的办大学思想。他认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主体性，造就完美的人格。他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教育的目标在于“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蔡元培的办大学思想集中到了本书的题名《大学之所以为大》上。对此，他认为前提是大学要“教育独立”。在此基础上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实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网罗众家”，大师引领；教学广博，通识为主。这样才能体现出大学之“大”，抓住了大学的本原。对这些理念，他用几任校长的言论与业绩，用北大名师的治学与成就，在多篇文章中林林总总做了细致精彩的描述。这对治理当前大学的许多问题无疑具有头等的原则意义。

对于当下大学教学问题，张教授有许多切身感受，因此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想法和建议，比如，对加强主干基础课的看法，对大学生学习中的“四多四少”问题的分析，等等。不过，他集中关注的还在于“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高等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新潮，它是经过香港和台湾大学的推介从美国一些大学传过来的，在大陆高校很有市场，尽管它至今并未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认可。我个人认为，通识教育与我国大学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有相通和相似之处，它们都有利于达成教育“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的目标，而使用“通识教育”这个名称更易于与海外和国际交流，应该允许充分发挥“通识教育”这个名称的作用。翼星教授就是从育人的根本主旨出发来看待通识教育功效的。他认为德、智、体、美全面育人的核心在于“通”，这就要打破专业界限，追求“博通”。从这个角度和基础上，他对通识教育的含义和要求，意义和作用，以及实施

方法，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在赞同他的意见之余如果有所补充或强调的就是：我认为通识教育在对形成与人的文化水平与地位相适应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信仰上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美国一些大学的通识教育在几经起落后，特别珍视和坚守着的就是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要真正从理性与感情上树立虔敬的价值信仰，在做法上就要特别注重“深度阅读，深层思考，辅以小班讨论”。对许多学校这是难以达到的，但是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这却是必要的。这也是张教授所十分强调的，通识教育要防止流于浅薄，可惜这是眼下通病。

张翼星教授这本书还有许多精彩的看法，比如，他认为“北大基本传统”应该概括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要凝练一个大学的精神，体现大学的灵魂，是很不容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就北大而言，无论从历史、从影响、从特色出发，“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最恰当的。限于篇幅，对他的许多有见地的言论不能再多加评说了，我想读者读了以后自然会得出：本书对诊治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是有相当帮助的。

王义道

2012年5月30日于北京蓝旗营

前 言

——我在北大怎样思考教育问题

我在195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时，正是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之后。由于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这次院系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培养专才的模式。哲学系设置哲学与心理学两个专业。专业下面分了很多个教研室（按苏联各大学的做法）。不同专业之间、各个教研室之间很少联系。这种模式使得师生的思想视野和专业知识都受到严重限制。更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教育培养人的自身功能已基本消退。1958年经过“红专大辩论”，更加明确地宣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师生经常下乡、下厂劳动，便把原来培养专才的教育模式也冲击掉了。在那些年月里，只要谁想在专业上有所作为，想把自己铸造成才，就会被指责为“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难免受到歧视和批判，似乎只要讲点空头政治，表示拥护那些“左”的观念与口号，就可以“以红带（代）专”，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到60年代中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术和学术权威，通通打倒在地。文化和教育领域，十年之间成为一片荒漠。这就是50—70年代上学的这一辈知识分子成长的大背景，造成了这辈人在专业和治学上难以弥补的缺失。我们中许多人是愿意努力读书和认真治学的。但二十多年中的政治环境与氛围、教育路线与制度，实际剥夺了我们读书、治学的条件，损害了我们读书、治学的能动性。当这种路线和氛围有所改善时，我们这一辈人已步入中年或晚年。

1960年毕业，我侥幸留在系里工作，后来被安排的专业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自己又涉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毕业后我参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将近40年，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政治动荡和为家庭生活奔波中度过的，虽曾忝称“教授”与“博导”，并有某些较好的教学反映和获奖的科研成果，但我深知自己在专业上基础差、功底薄，虽作了一定努力，仍

难免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1994年北大开始设置文科综合试验班。鉴于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急功近利的倾向，大学里普遍重理工、轻人文，文、史、哲等基础人文学科受到冷漠，原来的学术大师相继辞世，人才青黄不接，社会上道德滑坡，人文精神衰退，文科试验班试图通过保送招收一批学生，集中进行文、史、哲主干课程的学习，为培养人文学科的高质量人才和输送优秀研究生创造条件。我感到这种设想有其合理性，愿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因此，我虽年逾花甲，仍自愿担任首届班主任，后又任教学领导小组副组长。我主张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要求打通文、史、哲，进行综合性的基础训练，并在教师引导下，直接攻读经典原著。我还在班上倡导“尊师重道，奋发有为”的班风。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就业形势和教学模式、课程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文科试验班的设想难于实施，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试验班的毕业生最后从事人文基础学科的研究者，只是少数。不过，在首届学生行将毕业时，我仍约请了一批教师总结经验，撰写关于如何培养人文学科人才的文章，并且汇集了首届学生的毕业论文，由我主编并出版了《育才之路新足迹》一书。

1999年，首届文科试验班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便到了退休年龄。但试验班的工作却更加激发了我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兴趣。2001年，我又积极参与了北大老教授教学调研组（其他学校按教育部规定，称“教学督导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课等形式，对全校本科生的教学进行调研，了解情况，汇报交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全组成员来自各个院系，都是退休教授，一般对北大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愿意在促进教学上发挥一分余热。我觉得教学应当是全校工作的中心；本科生教学又是整个教学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人才的质量和研究生的培养。我在北大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对北大是有感情的，并且深知北大在全国教育事业中所处的位置。因此，能将晚年的部分时间与精力倾注在促进北大的本科生教学上，并从中开展教育问题的研究，实在是晚年的一种寄托和慰藉，也是一种享受和乐趣。我在这个组里总是以积极的姿态付出了较多的心力，边工作、边思考、边研究。总共11年，是有收获的。较长时期任组长，我总想使这个组工作得活跃一些，让“余热”能尽多地发力，在促进教学上实际地发挥作用。结合教学调研组的工作实践，我确定自己晚年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哲学和教育。在教学、教育和哲学的关系上，我形成了两个“不可分

离”的认识。一是教学与教育的不可分离，各种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安排，师生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与一定的教育思想相关联。我不主张把教学中的问题看做单纯的技巧、方法问题。若单从技巧、方法上去分析、总结，只是表面工夫。实际上在教学的背后，总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在主导。我看到一些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干部，很多人是很忙的，但多半忙于行政事务，满足于对付上面的“布置”，而不太思索和研究教育问题。二是教育与哲学的不可分离。教育是要发掘和实现人的潜能，全面提高人的真、善、美的品质，培养健全的人格；哲学是探索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寻求人在世界的安身立命之处。二者都是以人为对象。哲学是以概念、命题和论理的方式探索世界的奥秘和人的归宿；教育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寻求治学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杜威与胡适都说过，历史上的大哲学家有哪一个不是教育家呢？西方的苏格拉底与康德，中国的孔子与蔡元培，岂不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么？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哲学教师，但为什么不深入地思考当代中国令人困扰的教育问题呢？因此，我一边从事教学调研工作，一边认真读书，查阅教育史料，从历史到现实，反复思考，我逐渐地形成了一些看法。十余年来，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蔡元培全集》、《胡适文集》，涉猎了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些原著和史籍，并实际查阅了有关北大校史的资料，在思考中陆陆续续地写作和发表了 50 多篇文章，现在选出 48 篇，集结于此。

首先，大学之大，究竟大在何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大学自上而下地刮起一阵合并之风，各省各地的高等院校纷纷就近合并。这种合并，虽未经充分论证，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如果合并管理得好，可以加强大学的综合性、互补性，优化师资队伍，并有利于沟通文理，扩大视野，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但随后大学便有愈办愈大的趋势，主要从数量、规模上追逐一个“大”字，并竞相攀比。我将这种趋势与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大学之大的本来意蕴相对照，深感不尽一致，并包含若干层面之误解。我理解大学之大的基本含义有四：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学术思想的自由宽容之为大；学术大师的显著影响之为大；教育内涵的广博通达之为大。其中学术上的自由、包容是最基本的含义。蔡元培曾说：“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所说，不妨同时并行，

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①我于2006年撰写了《谈谈大学之所以为大》一文，发表于《现代大学教育》，后又由《新华文摘》、《报刊资料索引》、《黄河文化论坛》等刊物转载。此文的基本思想可说是这本文集的主题，因此，由作者本人题写“大学之所以为大”，作为书名。

与大学之大密切联系的，是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问题。究竟什么是北大的传统？对北大传统或“北大精神”，历来有不同说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出不同的概括。基本上是两种角度：社会政治的角度和学术文化的角度。但大学既是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北大更是全国学术文化的重镇，北大的传统就应侧重于学术气象上去理解。大学之大也首先体现在学术的无限宽阔和包容性上。我认为可以把北大传统区分为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比如，爱国主义；民主、科学、改革、进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等等，都可看做北大的传统，但还有一种气象、一种氛围、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这就是由蔡元培融合中西学术、文化而明确提出的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北大的基本传统。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的体现和继承，它开辟了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是否肯定和继承这个传统，是北大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北大人应当坚决维护并积极弘扬这个富于生命活力的基本传统。

蔡元培是我国现代最卓越的教育家，他不仅奠定了北大的基本传统，而且他的大学理念和高等教育观，在我国现代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开创了一代新风，铸就了一代辉煌。他是我国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有代表性的教育家。那么，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基本或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大特色：一是凸显一个“人”字，他要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全面成长的人，一种健全的人格；二是凸显一个“大”字，他是我国现代“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的奠基者，他希望在北大和全国培养出大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来；三是凸显一个“美”字，他强调美育，以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从总体上看，他是要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主体性；推崇学术，以学术之生命为大；倡导美育，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境界。他是要培养一种学问、道德、情感臻于和谐一致的人。这种教育思想蕴含着持久的魅力。我们当前的教育正在大声呼唤着蔡元培，要求回到蔡元培。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74页。

一所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在教学内容和学科建设上，应当以什么为重？我认为应当以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为重，这也是大学之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当前的许多综合大学里，分支学科不断膨胀，基础学科却逐渐萎缩，应用的色彩越来越浓厚，理论的成分越来越淡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历来强调经世致用，缺乏逻辑的分析和论证；我国的现当代教育，又受到国际、国内实用主义思潮的连续冲击；市场经济的商潮中人们又更加急功近利。久而久之，从上而下，人们理论思维的层次逐渐降低，深入探究问题的兴趣日益减弱。这实际潜藏着我国科学和理论发展的严重危机。为促使领导方面和有关部门重视，我回顾了前辈学者们的呼吁，并且提出了加强基本理论、基础学科和主干基础课建设的若干意见，认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大计和当务之急。

怎样选择大学的校长？北京大学的历史名声，是与这所大学的校长的贡献密切相关的。北大之大，也体现在校长的胸怀、学问和胆识上。我翻阅校史和感同身受，一百年来，北大还是五大校长最为突出，他们是：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严复是北大第一任校长，他是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在我国开创教育救国的道路，最早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他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主张从体用一致上全面学习西方的长处。严复任北大校长虽只半年多，却曾多方筹措经费，并坚决抵制当时官方试图停办北大的动议，专门发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的说帖，义正词严地维护了北大的生存权利。蔡元培无疑是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教育家，并且是开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科学文化新潮流的代表人物。他把西方现代大学的理念和体制引进中国，结合中国教育传统，提出了建设中国现代大学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他主张在基本体制上实行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术文化上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培养方针上实行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养成完善的人格；教学内容上实行选科制，沟通文理，并且顺其自然，展个性，促进高素质人才的涌现。通过改造和建设北京大学，这种理念和举措，酿成一股新潮，影响到全国，促进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蔡元培正是这种转型中的教育家。我们应当复兴一种蔡元培的真实形象和大学理念。在北大校长中，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除去西南联大那一段，他主持北大校务，也长逾17年之久。但他的作用与贡献，由于多种因素而有些被遮蔽、被忽视了。实际上他是蔡元培教育主张的坚决实施和积极发扬者，

又是北大师生历经沧桑、共渡难关的重要支撑者，他还是崇尚学术、张扬个性的大力倡导者。他强调教育就是要培养“活泼泼的个人”，具体要求是：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健全之人格、精确明晰之思考力。胡适是我国人文学科大师兼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学工作 20 多年，1946—1948 年任北大校长。他在教育哲学上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毕生不忘科学和教育救国，他也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积极贯彻者，现代通识教育的有力倡导和践行者。他鼓励青年把自己铸造成器（才），依照个人的兴趣与天赋选择专业，并始终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思考。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他是北大首任教务长、解放后首任校长。他是北大爱国主义传统的阐发和力行者。在《北大之精神》的演说中，他把北大精神表述为“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1940 年因激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和官僚家族的贪污腐败而被监禁四年之久，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58—1959 年因《新人口论》的主张而受到来势凶猛的批判与围剿，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作任何妥协性的自我检查。他也是北大学术自由传统的坚决贯彻者。他对学生平时的学习、生活与健康倾注着满腔热忱，关怀备至。这五大校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他们的共性是：1. 都是学问家兼教育家；2. 长期在北大工作，对北大的历史和现状都充分了解；3. 都尊重学术，主张学术自由，爱惜人才，并且善于吸纳和包容有各种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人才。他们又有鲜明的个性。比如严复的稳健笃实和讲究和合；蔡元培的恢弘气势与宽阔胸怀；蒋梦麟的认真务实和敢于担当；胡适的渊博倜傥与平易近人；马寅初的坚定信念和关爱学生。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和认真学习。

通识教育是现代国际高等教育的一大潮流。我们究应怎样看待通识教育？2001 年我参加北大老教授教学调研组工作时，北大正开始设置通选课，并设立元培学院，作开展通识教育的试验。元培学院内一年级不分院系和专业，主要选修通选课，二年级后可选择专业，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并设导师制，试行弹性学制。十余年来，这一方案的试验，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与经验，但由于不少人比较习惯于专才教育，难于达到共识，因而一直未能在全校推广。北大每年开设 120 门左右的通选课，多半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使学生扩大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陶冶。但总有少部分课程不符合通识教育要求或质量不高，并且文科课程与理工科课程之间很不均衡，文科学生难于选到适合于他们的理工科课程，难以达到沟

通文理、接受科学精神陶冶的作用。十多年来，通选课一直缺乏自觉的建设和改进，基本呈现自发状态。我曾建议学校成立通识教育中心或领导小组，专门研究通识教育中的问题，通盘考虑和全面规划通选课的设置与建设，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我呼吁了十年，见不到任何回应。这更激励我把通识教育作为思考重点，认真阅读国际、国内有关通识教育的论著和文章，就关于通识教育的渊源和根据、通识教育的含义和要求、通识教育的意义和作用、通识教育的问题和趋势，以及北大通识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和建议，提出了我的初步研究的见解。其中我思考比较成熟的，是关于**通识教育的基本含义和要求**：一是**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二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这可以看做开展通识教育，设置和建设通选课的一个准则。同时，我认为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是当前高等教育和教学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果说中小学教育的突出问题仍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的话）。通识教育不但不应与专业教育相对立，而且正是为优质的专业教育铺垫更为宽实的基础。如果通识教育确实排斥或削弱了专业教育，那么这种通识教育就是不成功或不太成功的。此外，如何处理通识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与教育部屡屡强调的“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如何妥善安排通选课与公共政治课、各类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如何适当减少公共必修课，加强通选课，减少强制性，加强学生的选择性、主动性，也是当前大学教学应当重视的问题。

大学教师的职责与作用，在一所大学里，是关键问题。**大学教师的天职**究竟是什么？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个方面：1. 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把教学置于首位；2. 正确处理治学与做人的关系，把“人”字写端正；3. 正确处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视学生为主体。

从总体上看，当前大学的本科教学，应当认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1. 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我深切地感受到，过去的那种狭隘的专才教育，知识结构和专业基础太窄，只能培养短期需要的人才，要培养大学问家、大科学家是不大可能的。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又怎能真正的“崛起”呢？出路还在于自觉地开展通识教育，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博与专的结合。2. 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教学中，我始终认为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引导。只有把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学生都是“活泼泼的”主体，才会有理想的教学效果。这里

并没有否认或轻视教师的作用。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而不是一味地灌输。启发式显然比注入式要难。这就要求教师，如蔡元培所说：一要积学，二要热心。首先，教师要长期努力地积累学问，以自己比较深厚的学识去影响和启发学生，同时对学生满腔热诚，尽力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兴趣。但长期以来，大学的课堂教学，基本上还是注入式，教师满堂灌的方式很少转变，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受到压抑。与此相联系，据我在课堂内外的观察和了解，许多学生在学习中呈现出“四多四少”现象，即上课多、自学少；进教室多，进图书馆少；读教材、讲义多，读原著、名著少；被动接受多，主动钻研少。这些现象正是说明学生的主体性没有体现出来。高质量的大学教学，应当把这种现象逆转过来，即自学多于听课；进图书馆多于进教室；读原著、名著多于读教材、讲义；主动钻研多于被动接受。为此，我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讲“应当重视”；第二篇讲“为何出现”；第三篇讲“怎样转变”。

教学中的基本功训练是什么？在文科综合试验班的工作中，我曾着重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训练：一是，按中国传统思想和典籍的特点，打通文、史、哲，进行综合性的阅读、思考和钻研；二是，直接攻读经典原著，要求读懂、读熟，读出自己的见解和体会来。我要求将这两个方面的训练，作为试验班在教学上的基本要求。直接攻读原著，我一直认为是人文学科师生的基本功训练。是治学上登堂入室的必经途径。这一点其他学科也值得重视。可是，长期形成的应试教育，却使学生的学习围着考试转，而考试又围着教材、讲义转。这不但忽视了治学上的基本功，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而且引导青年一代逐渐离开了人类精神的家园。这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误区。古今中外的原著和名著，大都是经过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文化成果，往往提出或回答了时代的重大课题，凝结着人类或各民族的卓越智慧。引导学生直接攻读这些著作，不仅是治学的依据，而且可以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增进科学与人文素质。我一直认为，这对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都有教益，应当在全民族中大力倡导。在教学调研组的听课过程中，我陆续写了一些听课的纪实与感想，这里选了几篇，重点也是引导原著与名著的阅读。

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了 50 多年，长期萦回脑际，难以忘怀的是什么？还是老一辈学者、师辈们的音容笑貌和精神品格。我除了撰写《难以消逝的思想烟云》，编著《人类精神的自由反思者》二书（二者均已出版），还写了一些文章，这里收入了四篇。

今日大学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仍在**体制改革和学风整顿**。尤其是体制改革问题，既关键又艰难。作为一般学者和教师，实在有些无能为力。这里只是记下了一些零散的初步思考。至于比较完整的实质性探索，只能有待于晚年的下一步了。

我深知自己水平低、基础差，对于教育仍是门外汉。书中缺点、错误一定很多，我恳切地期待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目
录
CONTENTS

序

前言

大学之大

谈谈大学之所以为大……3

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12

时代呼唤蔡元培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21

必须加强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的建设

——我国综合大学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33

大学教师的天职……42

我国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实行的三种转变……49

通识教育

试论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61

北京大学通选课的现状、问题和建议……72

加强主干基础课建设的若干问题和意见……82

当前大学本科教育中的两个问题……89

我对大学通识教育的几点认识……95

中学文理分科问题之我见……102

北大校长

- 维护北大，实行改革的重要先行者严复……111
-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开创者蔡元培……123
- 尊重学术，共度时艰的大力支撑者蒋梦麟……136
- 张扬个性，培养兴趣的积极倡导者胡适……146
- 关注民生、追求真理的爱国者马寅初……156
- 应当怎样纪念蔡元培？……163
- 胡适对青年读书治学的希望……171
- 大学校长应当是怎样的？
- 谈谈北大五位校长的共性与个性……177

原著攻读

- 迫切的问题，是要读名著、原著……187
- 中国人首先要读的两本书：《论语》和《老子》……189
- 从直接攻读原著入手
- 关于哲学教学改革的一项建议……194
- 我对文科综合试验班的认识和设想……200
- 北大文科综合试验班的一个基本书目……211
- 谈谈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215

课堂记述

- 让经典的魅力吸引年轻人
- 记王余光教授的“中国名著导读”课……225
- 一本原著，引进哲学的殿堂
- 记吴增定教授的“哲学导论”课……231
- 揭开小说创作的奥秘
- 记曹文轩教授的“小说的艺术”课……236
- 深受欢迎的“三宝”课
- 记通选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242